臺大歷史學報第 37 期
2006 年 6 月，頁 301~318

BIBLID1012-8514(2006)37p.301-318
2006.5.4收稿，2006.6.23通過刊登

§研究討論§

亂世從政之地理指南
——羅澤南手稿《皇輿要覽》初探

范　廣　欣*

提　要

郭嵩燾編《羅忠節公年譜》所載羅澤南諸著作，至今尚未找到刻本的只有《皇輿要覽》，該書手稿在長沙湖南省圖書館發現，迄今沒有被認真討論過。本文主要分為兩部分，先通過分析《皇輿要覽》的目錄，瞭解全書的基本架構，再重點探討其中有關水利和軍事的內容。羅氏寫作此書時，發現已經不能寄希望於長期教化，必須採取堅決果斷且能立刻見效的措施，以制止迫在眉睫的動亂。在這一過程中，他覺得理學資源不敷應用，必須借助考據學和史學所提供的資源，瞭解客觀事實和具體問題，並且找到應對的辦法。這也使他眼界開闊，比同時代絕大部分人更早發現外部世界，更早警覺西方對中國所構成的威脅。

關鍵詞：羅澤南　《皇輿要覽》　亂世從政　地理指南

*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副研究員

一

羅澤南（1807~1856），湖南湘鄉人，字仲嶽，號羅山。咸豐二年（1852），率先倡辦團練與太平軍對抗，後為湘軍將領，轉戰鄂、湘、贛三省，六年進攻武漢時中炮死，謚忠節。起兵前講學鄉里，好程朱理學。王鑫、李續賓、李續宜兄弟、楊昌濬等湘軍名將多為其弟子。郭嵩燾（1818~1891）編《羅忠節公年譜》所載羅氏諸著作，至今尚未找到刻本的只有《皇輿要覽》。2004 年 1 月，本人在長沙湖南省圖書館發現該書手稿，一共四冊，全帙共 300 頁，高 26.5 公分，寬 15 公分，[1]不分頁碼。據目錄，全書共九卷，三十二篇；第二十四篇至三十二篇，卻有目無書，有些地方有塗改痕跡，部分文字難以辨認，對使用者造成一些不便。據我所知，羅澤南同時代的友人對這一著作僅是一筆帶過，研究者更未徵引運用。[2]

「皇輿」意為國家的版圖，劉蓉（1816~1873）提及此書，指出從書名便可看出《皇輿要覽》寄託了致用的願望。根據自序，本書作於道光三十年（1850）至咸豐元年（1851)，距作者另一更為知名的著作《小學韻語》[3]草創僅僅兩三年，卻差別顯著。首先，《小學韻語》著重於長期教化，不依賴國家機器，而本書則著重於救急，必須與政治權力結合起來，才能解決當時迫在眉睫的具體問題。其次，《小學韻語》是對朱子有關著作的改寫，強調程朱道統，經常引述宋儒的文字；而本書與羅氏之前的其他著作都不同，著重考證山川河流、地理沿革、收集資料，明顯與考據學和嘉道以來史學的潮流有更密切的聯繫，引述更多的是五經

1 感謝湖南省圖書館古籍部荀先生提供有關資料。本人 2003 到 2004 年，先後去北京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和湖南省圖書館查找有關晚清湖南理學家的史料，發現後者不僅藏書更富，而且收費低廉、服務周到，閱讀環境寬鬆，在此一併致謝。

2 見劉蓉，〈祭羅忠節公文〉，《養晦堂文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664；曾國藩，〈羅忠節公神道碑銘〉，《曾國藩全集・詩文集》（長沙：嶽麓出版社，1985），307；郭嵩燾，〈羅忠節公墓誌銘〉，《郭嵩燾詩文集》（長沙：嶽麓出版社，1984），388。

3 羅澤南，《小學韻語》（長沙：出版社不詳，1856）。本文作者有另文討論此書。

（尤其是《尚書》、《周官》），而非四書或宋儒的著作。

以下正文主要分為兩部分，先通過分析《皇輿要覽》的目錄，瞭解全書的基本架構，再重點探討其中有關　水利和軍事的內容。

二

手稿第一冊正文之前收入全書目錄如下，頗值得玩味：

卷一	篇之一	通篇總冒
	篇之二	言黃河源委
	篇之三	言大江源委
卷二	篇之四	言黃河以北山東、直隸、盛京水道
	篇之五	言吉林、黑龍江水道
	篇之六	言大江以南吳淞、浙江、福建、兩粵水道
卷三	篇之七	言外蒙、西域水道由外夷達海者
	篇之八	言西域及內蒙古之水流入沙漠者
	篇之九	言雲南、西藏水道由外夷達海者
卷四	篇之十	言崑崙，言北幹及北幹之北外蒙古、黑龍江以北山脈
	篇之十一	言中幹山脈
	篇之十二	言南幹山脈
卷五	篇之十三	言黃河水患
	篇之十四	言淮河、大江、直隸、太湖、浙江水患
	篇之十五	言西北諸省水利
	篇之十六	水利總論
卷六	篇之十七	言鹽政、鋼政、賦稅、漕運及理財之道
卷七	篇之十八	言直隸、盛京、吉林、黑龍江及察哈爾形勢
	篇之十九	言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形勢
	篇之二十	言山西、陝西、甘肅、四川形勢
	篇之二十一	言山東、江南、浙江、福建、廣東形勢

	篇之二十二	言廣西、雲南、貴陽形勢及山防、苗防
	篇之二十三	言山防、苗防及總論形勢
卷八	篇之二十四	論內蒙古、外蒙古形勢
	篇之二十五	論青海、西藏形勢
	篇之二十六	言伊犁回疆形勢
卷九	篇之二十七	言外夷朝鮮、俄羅斯、哈薩克、布魯特、布噶爾、巴達克山、烏愛罕、廓爾喀、緬甸、印度、暹羅、越南各國形勢[4]
	篇之二十八	言東南洋海島形勢
	篇之二十九	言小西洋各國形勢
	篇之三十	言大西洋各國形勢
	篇之三十一	言海外亞墨利加洲、墨瓦蘭洲形勢
	篇之三十二	通篇總結

為了更好瞭解此目錄的含義，我們需要結合討論羅澤南的〈通篇總冒〉，和 1950 年 10 月手稿發現時，湖南省文管會主任陳浴新所作識語。羅氏原文一開始便指出，清朝擁有天命，因此幅員廣闊，領有包括盛京、吉林、黑龍江在內的二十一省，統稱為內地，以及西藏、青海、內外蒙古以及伊犁回疆（包括今天中國新疆及毗鄰中亞地區）等邊疆，統稱為外藩。內地和外藩加起來便構成羅氏心目中的國家疆域。這一點本身便值得玩味。清朝人一般講內地十八省，盛京、吉林和黑龍江長期由滿洲將軍管理，實際上是當作滿洲人的保留地，柳條溝以外不許漢人移民，直到二十世紀初才改設行省。可是，早在十九世紀中，在羅澤南看來，這塊行政管理上的特區已經和十八省一樣融合成為內地了。[5]這是其一。

4 根據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頁 14723，烏愛罕應作愛烏罕，即阿富汗；布噶爾所指不詳，疑為筆誤。

5 本文初稿認為，羅澤南在東北建省五十多年前便提出「東三省」的說法，在他看來，東北已經和十八省一樣融合為內地。承蒙第一位審稿人賜教：「東三省建省時間雖晚，但清朝時人早已習稱『東三省』。官書《實錄》最早在雍正十年九月就已有如此用法，『塔爾岱，著授為黑龍江將軍。統領軍營東三省兵丁』。乾隆以後就非常普遍，據中央研究

其二，有人認為清朝在西藏等地採取羈縻政策，並沒有清晰的國家疆界的意識，然而，羅澤南雖然覺得外藩與內地有所差別，卻更突出他們與「外夷」不同，都是清朝的領土。他提到伊犁時，還不忘指出：「雖郡縣未設，其管轄直同於內」。[6]接下來則說，自古以來，每一朝的疆域或大或小都不同，清朝幅員之廣，僅次於蒙元；他甚至對清代領土四至的經緯度都有相當具體的紀錄，並且用儒家的觀念來解釋滿洲的領土擴張：「夫國家之臣服邊陸，大啟爾宇，初非務勤遠略也，因乎時，乘乎勢，時至而勢歸，聖王有所不能卻也。」[7]在他看來，臺灣、外蒙、西藏、青海以及西域，都是為平定侵擾而不得已納入版圖。他進一步指出，在如此遼闊的領土上，人民眾多，政治複雜，必須興修水利，安定人民的生活；必須保衛險要地方，鞏固邊疆，平定可能的動亂；並且在此基礎上因應各地不同的風俗，致力教化，恢復人民善良的本性。最後結論回到傳統的天命觀和民本思想，引用《尚書》「非天私於有商，惟天佑於一德，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於一德」，激勵統治者。羅澤南未嘗不知滿洲興起，先問鼎中原、再開疆拓土的歷史真相，卻希望用儒家的觀念，把清朝轉化為他心中的理想國。結合當時的實際情況，他也是用這個希望說服自己，投入為保衛清朝所代表的政治、文化秩序而進行的生死搏鬥。

陳浴新所作識語，見於《皇輿要覽》第二冊卷三篇之七前。他指出該書共九卷，分卅二篇，自第一篇至二十三篇止，共分為四本，主要談國內各省形勢，旁及鹽漕水利，對全國山川河流瞭如指掌。自二十三篇（應為二十四篇）至三十二篇，多言外藩及遠海形勢，卻有目無書，可

院漢籍電子文獻搜尋，乾隆朝《實錄》中就出現九十餘處『東三省』的用法。既然官方上諭都如此使用，民間使用亦不足為奇，如魏源在〈答人問西北邊域書〉中即言：『除盛京、吉林、黑龍江號東三省，為滿洲根本重地，不屬邊防外……』，亦稱為東三省，且認為不屬邊防外藩。因此，羅澤南此種看法並無特殊之處，不宜過度強調。」非常感謝他的批評，令我發現這一疏忽。可是，原文強調之重點除「東三省」這一稱呼外，更在於羅氏將東北和傳統十八省統稱為內地，與外藩相對，後者似乎仍有保留必要。

6 羅澤南，《皇輿要覽》手稿（長沙：湖南省圖書館藏），第一冊，卷一，篇之一。

7 羅澤南，《皇輿要覽》，第一冊，卷一，篇之一。

能本來就沒寫完，也可能原稿遺失。陳氏認為，該書源於清初徐乾學（1631~1694）《一統志案說》，而徐書又以顧炎武（1613~1682）《肇域志》為本，三書同樣談地理形勢，卻有高下不同，顧炎武為恢復漢家河山，而其他兩人則為鞏固滿清統治。在他看來，羅氏原稿雖缺，卻也無關緊要，新中國建立以後，民族團結，國家統一，民族之間不再爾虞我詐，所以「外藩」部分的討論失去現實意義；道咸之間，對海外的知識相當貧乏，即使魏源（1794~1857）的《海國圖志》也已過時，羅澤南的著作更不可能有多大的成就。最後他指出，羅澤南寫作本書時，還在靠教書謀生。

陳浴新的介紹補充了一些有用的資料，包括原稿發現時的情況，卻也不無偏頗之處。其一，除了徐乾學和顧炎武之外，羅氏此書應該還受到其他人的影響。羅澤南曾經告訴劉蓉他編寫此書的計畫，劉蓉回信肯定水利、邊防、河患都是有用的學問，但是卻認為不必花心思專門寫這樣一本書，因為前人的著作已經足夠參考。例如顧祖禹（1631~1692）的《讀史方輿紀要》，就考證詳細，涵蓋全面，難以超越。[8]顧氏的著作的確以地理環境和歷史事變相結合，研究軍事地理積極致用而聞名。[9]羅澤南寫作《皇輿要覽》，不是為了學術創新，而是為方便運用，所以後來並未接受劉蓉的意見，卻不可能不參考顧書。羅氏識語對資料來源說得很明白：

> 其中論說或本之國史，或採之前人，間以己見忝附之，一時集腋成文，所有稱引未及標出，自知不免勦說之譏，而其中差謬，尤待博雅之士教正焉。[10]

他不是不知道學術規範，卻本來就不是要寫一部學術著作，而是為集思廣益，有裨實用，所以便充分吸收前人的成果，而非專其一家。所謂「國史」即指官修史書，「前人」究竟包括哪些人，他這裏沒有講清楚，由

8 劉蓉，〈覆羅仲嶽書〉，《養晦堂文集》，245~247。

9 陳祖武，《清初學術思辨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241~242；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116~117、383~385。

10 羅澤南，《皇輿要覽》，第一冊，目錄之前。

於我所看到的並非全稿，所以也很難揣摩，下文還會繼續討論。準確地講，寫作本書不是羅氏研究地理的總結，而恰恰是其開始，郭嵩燾所作年譜，便多次記載了他在行軍打仗之際，對地形的鑽研，大到攻取武漢沿江東下的戰略構想，小到具體的戰鬥部署，都與其豐富的地理知識相關。[11]

其二，揚顧抑羅的評價也值得商榷。就作品本身而言，顧炎武的《肇域志》雖然開風氣之先，卻不是一部完整的著作，僅屬資料長編性質，未成為有系統的著述。[12]而羅氏此書卻有嚴整的結構和明確的主題，現存手稿關於東三省及邊疆地區的資料，限於歷史條件，顧炎武不可能接觸到，更不用說目錄中展現的世界意識：不僅包括內地、外藩，還包括內陸和海洋的諸外夷，也非顧炎武所能比擬。與顧祖禹一百三十卷的《讀史方輿紀要》相比，羅氏此書僅僅九卷，便涵括時人所瞭解的全世界，也更為精簡，方便宦遊或軍中攜帶和使用。就政治立場而言，羅氏身處清朝入關兩百年以後，沒有強烈的民族意識而忠於朝廷，情有可原，更何況以曾國藩（1811~1972）、羅澤南為代表的湘軍將帥不僅是為清朝而戰，他們更重視的是，從信奉拜上帝教的太平軍手中挽救傳統的文化和政治秩序。陳浴新的批評，明顯是清末民初以後漢族民族意識抬頭的產物。

其三，陳氏認為原稿卷八、卷九分別討論邊疆地區和外部世界，雖然缺失，卻無關緊要，完全是從實際效用出發，而忽略其學術和歷史價值。對邊疆地區的討論，正好同嘉道年間史學思潮，特別是其中邊徼地理學之興起相呼應。曾國藩和郭嵩燾兩人在京期間，都曾與治邊徼地理的名家張穆（1805~1849）、何秋濤（1824~1862）等人過從甚密，在有關羅澤南的文獻中找不到類似的記載。他在投筆從戎之前，活動的範圍不超過湘鄉、長沙一帶，通過什麼樣的途徑受到此類風氣的影響，的確耐人尋味。如果能夠發現這部分內容，不僅對分析羅澤南思想的淵源，而且對重新評估湖南之學的廣度，對探討學術風氣從中心向邊緣的傳

11 郭嵩燾，《羅忠節公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65、73、78、80~81。
12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383。

播，都有實在幫助。當然也有可能羅氏是在時代危機的刺激下，自發地關心域外問題。同樣，對於外部世界的介紹，不管具體內容是否準確，都值得重視。道咸年間，此類著作最著名的是魏源的《海國圖志》（初稿完成於 1842 年，1847 年始刻成），[13]和徐繼畬（1795~1873）的《瀛寰志略》（始作於 1843 年，1848 年刻成）。[14]魏源接收了林則徐（1785~1850）在鴉片戰爭爆發前後收集的資料，而徐繼畬本人就有在福建辦理洋務的經驗，後來還調任總理衙門，然而羅澤南當時卻只是在內陸省分湖南一個縣裏面擔任私塾教師，他的眼界看來卻並不狹隘。篇二十七介紹中國的陸上鄰國，篇二十八以後便由近而遠介紹海外諸國，從「東南洋海島」（今東南亞）、「小西洋各國」（大概是指印度洋沿岸各國，包括南亞次大陸、阿拉伯半島和非洲），到「大西洋各國」（歐洲各國），一直到「海外亞墨利加洲」（美洲大陸）、「墨瓦蘭洲」（相當於澳洲大陸）。[15]

二十多年後，梁啟超（1873~1929）出生於沿海的廣東省，家鄉新會距離廣州不遠，1887 年以後進入著名的廣州學海堂唸書。眾所周知，廣州是清朝最早與西洋通商的口岸，可是直到 1890 年梁啟超進京趕考失敗，途經上海，才第一次接觸到有關西學的中文書（即前述《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從而對外部世界有最基本的瞭解。[16]兩者反差之大，令人不禁沉思，羅澤南究竟通過什麼途徑得到有關資訊及觀念，又因何對外部世界產生瞭解的興趣？如果說是受到魏源和徐繼畬著作的影響，為何他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在湘鄉縣能看到此類作品，而三、四十年後梁啟超在廣州反而看不到？如果說是受鴉片戰爭的刺激，也有不合情理之處。我從《皇輿要覽》存稿中發現，羅氏關心東南沿海的防務，提到臺灣、澳門，卻沒有提到香港；他要防備的是葡萄牙人、荷蘭人，而不是

13 魏源，《海國圖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卷 743~74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4 徐繼畬，《瀛寰志略》，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卷 743。

15 關於「小西洋」和「墨瓦蘭洲」，下文再詳細分析。

16 Hao Chang,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59.

英國人。[17]令人懷疑因為交通隔絕，信息不暢，他其實並不知道香港割讓給英國的事實，甚至可能對已經結束的鴉片戰爭也不甚瞭解。事實上，我們知道第一次鴉片戰爭，未對內陸士大夫的思維和生活造成太大影響。種種疑問只能留待新的史料發現才能解答。

我這裏希望提供一個暫時的解釋，留待方家教正。我認為影響羅澤南的不是晚清通過魏源和徐繼畬等人的著作所介紹的近代地理知識，而是明清之際耶穌會傳教士介紹到中國的知識體系。主要證據如下：首先，羅澤南對世界地理的分類，與魏源和徐繼畬不同，更接近明清之際的習慣，從「小西洋」一詞的使用便可以看出來。《瀛寰志略》用一卷介紹亞洲的印度、中亞和西亞，另一卷介紹非洲，不再將它們統稱為「小西洋」；而且在地圖上標出傳統所謂「小西洋」，西方稱為「印度海」（即印度洋）。而《海國圖志》雖然仍以距離中國的海路遠近來介紹其他國家，分類卻有細微差別，比如書中用「西南洋」諸國泛指印度、阿拉伯等地，羅氏卻不曾單獨列出，而是併入「小西洋」，與明清之際地理著作相同。[18]

第二、更明顯的標誌，見於對世界第五大洲的稱呼，羅澤南稱為「墨瓦蘭洲」，而晚清的地理學著作都稱為澳大利亞，跟今天相同。明清之際，傳教士的地理學著作，如《職方外紀》和《坤輿圖說》，都指出世界第五大洲為西班牙臣子墨瓦蘭所發現，因此用他的名字來命名，稱為「墨瓦蠟尼加」或「墨瓦蠟泥加」。[19]最早把西方世界地理的知識傳到中國的，當屬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的《坤輿萬國全圖》，地圖上的文字也有介紹墨瓦蠟泥加洲的來歷。[20]墨瓦蘭也就是我們今天熟知的十六世紀航海家麥哲倫（Fernando de Magallanes, 1480~1521）。以上

17 羅澤南，《皇輿要覽》，第四冊，卷七，篇之二十一。

18 可參見〔明〕艾儒略，《職方外紀》所附地圖，收入《四庫全書》，冊 59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88、290。

19 分別見艾儒略，《職方外紀》，卷四，頁 329~330；〔明〕南懷仁，《坤輿圖說》，卷下，收入《四庫全書》，冊 594，頁 771。

20 朱維錚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1），218~219、249。

知識後來被收入清人編的《欽定皇朝文獻通考》，儘管編者抱持非常懷疑的態度。[21]羅澤南用「墨瓦蘭洲」，而不用比較普遍的「墨瓦蠟泥加洲」，可能是因為他讀書不夠仔細，只注意洲名源自墨瓦蘭的人名，而不知稍有變化。但也可能是他的此項知識並不直接來源於前述文獻，而是來自嘉慶年間徐朝俊所著《高厚蒙求．二集》，原文提到第五大洲指出：「墨瓦蘭實開此區，因以其名命之墨瓦蘭」。[22]事實上，明清之際傳入的地理知識並不完備，西班牙船隊在地理大發現期間，實際上並未到達澳洲大陸，當時傳入的世界地圖表明西方人還把「墨瓦蠟泥加洲」想像為一直延伸到美洲南端的南方大陸。直到 1770 年，庫克（James Cook）船隊才在澳洲東部海岸登陸，標誌英國佔領的開始和澳大利亞的真正發現。[23]十九世紀初以後，澳大利亞才成為通用的名稱。[24]

綜上所述，筆者暫時的結論是：羅澤南的世界地理知識來自於對明清之際第一次傳入的西方地理學的重新認識，而不是來自鴉片戰爭以後西學的第二次衝擊，因此他的知識並不是最新的。值得注意的不在於這些知識的準確程度，而在於他瞭解、正視外部世界的意識和願望。因為有這種意識和願望，所以他在十九世紀 40 年代的湖南鄉下注意到世界第五大洲的存在；反觀梁啟超，因為缺少這種意識和願望，所以他 1890 年前在早已是通商口岸的廣州讀書，卻沒有基本的世界知識。我們也可以瞭解到，明清之際西學的第一次衝擊，雖然當時並不為中國知識界的主流所接受，《欽定皇朝文獻通考》也好，《四庫全書》的編者也好，都採取了相當懷疑的態度，但是卻為人們迎接第二次衝擊或多或少準備了文獻資源，對於身處內地無法直接接觸最新西學的人，尤其如此。有時

21 嵇璜等奉敕撰，《欽定皇朝文獻通考》，卷二百九十八，收入《四庫全書》，冊 638，頁 708~709。

22 任復興，〈《瀛環考略》上〉，《任復興文集》，http://blog.zmw.cn/user1/70/archives/2005/2967.html，2006 年 1 月 27 日。

23 駱介子，《澳大利亞建國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16~23。早期中國人對澳洲開發史的介紹，可見徐繼畬，《瀛寰志略》，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卷 743，頁 45。

24 “European discovery and colonisation of Australia,” http://www.cultureandrecreation.gov.au/articles/australianhistory (Australian Government: Culture and Recreation Portal)，2006 年 3

候這種影響是間接的，羅澤南也許沒有讀過傳教士的著作，但是卻可能從徐朝俊的著作瞭解到有關信息。所以知識的來源雖然距離他生活的時代非常遙遠，但是其重新發現，卻與嘉道以來關心史地、注意實用學問的一種風氣有關。無論如何，羅澤南的世界意識已經使他站在那個時代的前列，即使通達世務者如劉蓉，同治年間擔任陝西巡撫，也還分不清回教和基督教的區別。[25]

三

羅氏此書資料豐富，內容複雜而專業。從目錄可知，主要討論涉及水利、財政和軍事三個方面的政治地理學，又以水利和軍事為重點。限於篇幅，不可能一一討論，下文擬從水利和軍事入手，略做介紹，希望能夠發揮以管窺豹的作用。

卷五篇之十六〈水利總結〉，一開始便把在西北興修水利的構想，與選擇性地吸取井田制的優點聯繫在一起，大段引用《周禮》有關內容以及鄭玄的註釋，指出：

> 師其意亦不必泥其跡，寬閒之地能為井者，井之，不能井者，仿□溝洫之制，不限方圓，不限廣狹，不拘斜橫曲直，相地勢之高下而曲通之……至於窮山邃谷，幽仄盤錯之區，溝洫之法莫行也，而溪澗渠堰，正天地自然之溝洫，平衍之處，有湖，有潭，有陂，有蕩，難畫以經界也，而圍之，堤之，蓄之，洩之，亦依然溝洫之遺規。……因地制宜，皆有可以經畫者。[26]

寫作《皇輿要覽》的時候，羅澤南已經將之前在《人極衍義》和《讀孟子劄記》中流露出的激進復古主張放在一邊，[27]他認識到複雜的利益關係

月 25 日。

25 陸寶千，《劉蓉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298~301。

26 羅澤南，《皇輿要覽》，第三冊，卷五，篇之十六。

27 分別見羅澤南，《人極衍義》、《讀孟子劄記》（長沙：郁文堂，1859）。本文作者將另撰專文討論二書。簡言之，羅澤南的激進復古主張包括系統地恢復三代的封建、井田

難以處理，而王朝衰朽而造成的危機必須優先克服。然而他一向認為儒家經典，尤其是《周禮》，對三代制度的描述，不僅有助於將來重新實現理想政治，而且也有助於解決當下的問題。[28]當時正值國家的統一受到威脅之際，恢復封建制已經不合時宜。井田制本身要求改變土地的所有關係，自然更非動盪年代所適合。沒有封建和井田制做基礎，學校制度也不可能恢復。可是做為井田制一部分的溝洫之制，在羅澤南看來，有利於興修水利，灌溉農田，保障農業生產，而且在西北開墾荒地並不涉及大的社會變動及產權變更，卻有因地制宜、適當改造和恢復的價值。

軍事地理部分，僅以卷七篇之二十三〈言山防、苗防及總論形勢〉，以及篇之二十一有關閩粵沿海防務的內容為代表，略做介紹。篇之二十三是存稿的最後一篇。從對〈苗防〉的特別重視，可以發現此書寫作的一個重要淵源，即湖南士紳，尤其是湘西、湘南一帶士紳，長期與苗民作戰而形成的尚武傳統。清代中葉以來，白蓮教、少數民族和天地會在湖南屢次掀起反對清廷的武裝鬥爭，湖南士紳很早就組織團練與之對抗，長期的軍事活動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例如嚴如熤（1759~1826）就多方收集資料，著成《苗防備覽》[29]和《三省邊防備覽》[30]等書。此人是嶽麓山長羅典的學生，其著述得到陶澍（1778~1839）、賀熙齡的推崇，死後更入祀鄉賢祠，成為全省士人榜樣。[31]羅澤南自然不能不受這一傳統的影響。賀長齡（1785~1848）主編《皇朝經世文編》，更進一步加強了瀰漫在湖南士人中的經世致用風氣。然而，羅氏寫作此書最直接的動機還是即將到來的動亂。他明確指出：

> 曰塞防，曰海防，曰番防，曰蠻防，患之在邊地者也，其有不在邊地而在腹地者，肘腋之間，恒為禍機之所伏，防之不密，遂有發而

和學校制度，以及孟子讚頌的「爵祿代耕」制，用公天下否定家天下，用君臣共治代替君主專制。

28 羅澤南，〈與劉孟蓉書〉，《羅山遺集》（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7），290~291。

29 嚴如熤，《苗防備覽》（臺北：華文書局，1969）。

30 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卷 73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90~291。

31 龍盛運，《湘軍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27~34。

> 不可遏之勢。為人之一身然，風寒之感冒，病之自外入者也，血氣之凝滯，病之自內生者也，在外者猶可防，在內者難為瀉。況血氣凝則精力減，精力減則腠理陳，風寒之邪，尤易中之，保養不密，有不能保其無病者。[32]

意思是說內亂與外患相比更難防範，後果也更為嚴重，一旦內部崩壞，外患又乘虛而入，後果便不可收拾。前述劉蓉〈致某官書〉提到，正在進行的鴉片戰爭只是小患，醞釀之中的動亂才是心腹大患：

> 竊惟今天下之事，有不足憂者，有大可憂者，不足憂者，已形之患，嗅夷是也；大可憂者，方在隱而未形之閒，而有厝火積薪之勢，失今不圖，後將有潰裂四出而不可救藥者，此有識所同知而智士所竊嘆也。[33]

他們的看法正不謀而合。羅氏接下來引述歷朝歷代利用民間宗教組織群眾反抗朝廷的先例，強調事態之嚴重。在他看來：

> 〔變亂〕皆起於中葉以後，蓋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風聲鶴唳盡滋疑畏，守土之吏又惟粉飾太平，不思防制，胡邪匪因而竊發，以肆其虜掠之禍。官兵初利，猶可一撲即散也，不利則四方觀望之賊益從而聚之，燎原莫鄉，遂蔓難圖。是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夫禍之未起，以善政消之而有餘，禍之既發，以勦之而不足，不為曲突徙薪而嘗焦頭爛額，不亦晚哉。[34]

從中可以看到羅氏對歷史和時事都有很精闢的觀察，他在寫作時已經被一種強烈的危機感所籠罩。以下便具體探討在他看來最緊要的山防和苗防事宜。所謂山防，特別強調在各省邊界的險要地區佈防，否則「一隅有事，數省悉警」。[35]的確有先見之明，後來共產黨的紅軍就是在各省邊

32 羅澤南，《皇輿要覽》，第四冊，卷七，篇之二十三。引文原稿有改動，此處據改後文字錄入。

33 劉蓉，〈致某官書〉，《養晦堂文集》，153。

34 羅澤南，《皇輿要覽》，第四冊，卷七，篇之二十三。引文原稿有改動，此處據改後文字錄入。

35 羅澤南，《皇輿要覽》，第四冊，卷七，篇之二十三。

界的山區建立武裝和革命根據地。苗防在當時的背景下也有特殊意義，即防止民變和少數民族的反抗結合起來，以免左支右絀，無力彈壓，導致國家分崩離析。後來局勢的發展為羅氏不幸而言中，太平軍、捻軍和西南、西北各地的少數民族抗爭，尤其是所謂回亂，遙相呼應，湘軍花了很大的精力才控制局面。

羅澤南並非從純軍事的觀點出發，而放棄儒家的道德堅持。他在介紹山防和苗防的有關事宜後，便不忘強調戰爭與政治的密切關係。在他看來，不能以敉平戰亂取代良好的政治，但是當危機不可避免地來臨時，就必須充分運用地理知識，贏得戰爭。用他的原話說：

> 治天下之道，在德不在險也……古今以來，人君之享有利地者，或將千年或數百年，或數十年，或數年，久暫何若是之不同哉？非其地之有異，德有修不修也。且夫天下之險，豈僅在於地哉？

他從孟子「地利不如人和」的思路出發，指出君主的善政、大臣的盡忠職守、民心的向背，都是比地利更可靠的「天下之險」。但是與孟子略有不同，他對行軍打仗本身的規律也有足夠的重視，通過總結歷史經驗指出，生死存亡之際，能否充分利用地理條件，往往具有關鍵作用。[36]

《皇輿要覽》有關外部世界的論述雖然缺失，但是羅氏對外國人，尤其是西洋人的認識和興趣，卻可以從他對海防的關注瞭解一二，因此最後有必要檢查他有關閩、粵海防的意見。前文提到他似乎並不知道香港的割讓，卻對澳門的葡萄牙人抱有戒心，對澳門租借的來龍去脈和附近的地形瞭如指掌。他所設計的對策包括扼守交通要道，使洋船無法抵達；禁止糧食出口；取消小艇，使洋船無法靠岸等，也希望利用廣東強悍的民風，組織民兵作戰。這些都是林則徐於鴉片戰爭期間採取的策略，利用民眾排外更成為後來士大夫長期的思路。然而，在當時的情況下，以他的閱歷不可能有更高明的對策。值得注意的是，他懷有高度警覺性，一再強調防患於未然，他說：「佛郎機紅毛，皆非善類，內泊黃埔，逼近肘腋，世事之循環不可知，安知異同（日？）不貽我之深慮者？思患豫防，又不可以其無事而或怠之也。」對抱有天朝大國心態而沒有親歷

鴉片戰爭的內地士大夫來說，無論如何都是難能可貴的。

他對臺灣的歷史沿革和形勢也頗為熟悉，認為臺灣是東南沿海諸省的屏障：

> 其地北連日本、朝鮮，東接呂宋、琉球，南則交趾、暹羅、占城、六坤，皆近焉，西直通西洋，明時曾為紅毛之所居，地廣物饒，未免訛夷之涎貪，倘守之不嚴，以數千里之膏腴，資其停舶，倡合黨與，偪近門庭，沿邊諸省斷糧晏然無虞。夫籌天下之勢，慮必及乎其遠。臺灣之地，得之僅為一島，失之遂足貽粵東、閩浙之憂，而江南、浙（疑為衍文）、山東亦竊患其齒之寒者。惟戍之以重兵，而又守之以賢吏，以固民氣，以消夷志，庶乎五省有所衛，而不虞乎外患矣。[37]

「籌天下之勢，慮必及乎其遠」，正刻劃出羅澤南的深謀遠慮，以天下為己任。他雖然身處窮鄉僻壤，眼前卻似乎懸掛一幅囊括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戰略地圖，時刻在思考怎樣維護國家的權益，正所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我想這是他超越同儕，對外部世界感興趣的原因。但是，他的敘述也有不確之處，例如當時占城（今越南南方）早已被交趾（中國傳統對越南北方政權的稱呼）吞併，臺灣的幅員也沒有他想像那麼大，我們卻不應求全責備。畢竟他的知識都是源於書本，有的已經過時，有的並不可靠，但是他能夠從零零碎碎的資料中，建構一個完整的世界圖景，實屬難能可貴。他對臺灣戰略地位的重視，更久為十九世紀 70 年代以來的近代史所一再證明。

四

從《小學韻語》到《皇輿要覽》，雖然只有短短兩三年，形勢卻已經進一步發生了變化。前書是著眼於長遠，希望從根本上化解危機，但

36 以上見羅澤南，《皇輿要覽》，第四冊，卷七，篇之二十三。
37 以上見羅澤南，《皇輿要覽》，第四冊，卷七，篇之二十一。

是寫作後書的時候已經不能等待，必須採取堅決果斷且能立刻見效的措施，制止迫在眉睫的動亂。在這一過程中，羅氏發現理學資源已經不夠應用，必須借助考據學和史學所提供的資源，瞭解客觀事實和具體問題，並且找到應對的辦法。這也使他眼界開闊，比同時代絕大部分人更早發現外部世界，更早警覺西方對中國所構成的威脅。

（責任編輯：吳立仁）

引用書目

一、檔案史料

艾儒略，《職方外紀》，收入《四庫全書》，冊 59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郭嵩燾，《羅忠節公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
郭嵩燾，《郭嵩燾詩文集》。長沙：嶽麓出版社，1984。
劉　蓉，《養晦堂文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
羅澤南，《小學韻語》。長沙：出版社不詳，1856。
羅澤南，《皇輿要覽》手稿。長沙：湖南省圖書館藏，共四冊。
羅澤南，《讀孟子劄記》。長沙：郁文堂，1859。
羅澤南，《人極衍義》。長沙：郁文堂，1859。
羅澤南，《羅山遺集》。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7。
南懷仁，《坤輿圖說》，收入《四庫全書》，冊 59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魏　源，《海國圖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卷 743~74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徐繼畬，《瀛寰志略》，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卷 74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嚴如煜，《三省邊防備覽》，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卷 73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7。
嚴如煜，《苗防備覽》。臺北：華文書局，1969。
曾國藩，《曾國藩全集‧詩文集》。長沙：嶽麓出版社，1985。
朱維錚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1。
嵇璜等奉敕撰，《欽定皇朝文獻通考》，卷二百九十八，收入《四庫全書》，冊 63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

二、專書、論文

陳祖武，《清初學術思辨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龍盛運，《湘軍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陸寶千，《劉蓉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
駱介子，《澳大利亞建國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任復興，〈《瀛環考略》上〉，《任復興文集》，電子文件，http://blog.zmw.cn/user1/70/archives/2005/2967.html，2006 年 1 月 27 日。
“European discovery and colonisation of Australia,” http://www.cultureandrecreation.gov.au/articles/ australianhistory (Australian Government: Culture and Recreation Portal)，2006 年 3 月 25 日。
Chang, Hao.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Between Politics and Geography: A Tentative Discussion on Luo Zenan's Manuscript "Huangyu Yaolan"

Fan, Guangxin*

Abstract

In Hunan Provincial Library at Changsha, the author found Luo Zenan's (羅澤南) unpublished manuscript "Huangyu Yaolan" (《皇輿要覽》, *A Geographic Guide to the Imperial Land*), which has never been discussed by previous scholars.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manuscript through its content page and then explores the content concerning the geographic knowledge for military and irrigation uses. When writing the manuscript, Luo realized that a firm and efficient action must be taken to suppress the coming turmoil. Since Neo-Confucianism could not provide enough resources to do that, he had to refer to textual research and historical study to comprehend the general reality as well as the concrete issues, thereby finding a way to deal with them. This also allowed him to widen his view, so as to be able to confront the outside world and realize the threat from the West much earlier than his contemporaries could do.

Keywords: Luo Zenan(羅澤南), "Huangyu Yaolan"(《皇輿要覽》), Politics, Geography.

* Research Associat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